二战前秘鲁的日本移民研究

胡新苏[1]　韩　涛[2]

（1.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7；2.湘潭大学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秘鲁是近代南美第一个大量引入日本移民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第三大拥有日裔人口的国家，对其早期移民的探究有助于了解当今秘鲁日裔群体，也有助于理解日秘关系的发展。本文即主要主要从移民背景、移民阶段、移民的发展状况等方面展开，对这段历史加以概括性论述。

[关键词]二战前；日本人；秘鲁；移民

在影响日本与秘鲁外交关系的诸多因素中，日裔因素占十分重要的地位。截至2012年底，秘鲁的日裔规模已至9万，[1]这些人基本由二战前的日本移民及其后代构成。鉴于战后移民数量微乎其微，本文把论述的范围限定在二战以前，主要从移民背景、移民阶段、移民的发展状况等方面加以展开。

一、移民的背景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由于政府长期采取鼓励性生育政策和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人口讯速膨胀，引起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另一方面，工业化进程中中下阶层尤其是农民承受的负担过于沉重，失业和贫困问题严重，国内矛盾尖锐。为应对危机，日本政府大力提倡海外移民。[2]早先的目的地多为夏威夷和北美，到20世纪初这些地区加强了对日本移民的限制。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把更多目光投向了南美。

关于日本人到达秘鲁的记录至少可追塑到16世纪末[3]，不过，直到1899年以前，日本人在秘鲁的停留是零星、短暂和偶然的。十九世纪60、70年代，"卡亚尔蒂号"事件和"玛丽亚·露丝号"事件的相继发生促使日秘两国政府首次接触并于1873年建交。然而这种在意外事件推动下的建交具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此后的二十年时间里，两国之间几乎没有实质性往来。一方面，日本刚刚打开国门，无力顾及相隔遥远的南美；另一方面，秘鲁则忙于销石战争和在内乱中自顾不暇。直到90年代后期，德彼罗拉的重新上台使秘鲁迎来了难得的稳定政局，沿海种植园经济的发展使对国际劳动力的需求重新突显，在苦力贸易被废止的情况下，秘鲁找上了日本。

1898年，部分秘鲁的种植园主打听到日本森冈移民公司职员正在巴西推广移民，于是立即邀请其到秘鲁洽谈。秘鲁的主动令日本政府颇感意外，因为此前的移民计划并不包括秘鲁，但是两国不久就移民事宜达成了一致。秘鲁总统特别颁布法令允许日本人以契约劳工的形式入境。

二、移民主要的阶段

早期日本人的移民以1923年为限可分为前后2个阶段。前者为契约移民阶段，后者为邀请移民阶段。

（一）契约移民阶段

1899年4月，第一批日本人790名抵达卡亚俄港，拉开了大规模移民秘鲁的序幕。这一阶段移民的绝大多数作为契约劳工进入秘鲁沿海各地种植园从事农耕。这些移民由日本政府支持的私人移民公司招募和运送，费用由种植园方支付。移民主要来自本土西南偏僻的农村和冲绳地区的青壮年，到1923年为止，共有超过18 000名日本人以这种方式进入秘鲁，其中包括2000余名女性和儿童。[4]

（二）邀请移民阶段

从移民一开始，围绕劳工待遇的谈判从没有中断过，契约条款的不断变更反应了这一现象。到20世纪20年代，移民公司和种植园方面都发现维系这一制度的成本越来越大，农场主们倾向于雇佣更多的本地劳力。1923年，秘鲁废除了契约移民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移民的终结。相反，自1922年开始，日秘两国实现了直接通航，大大便利了人员往来。国际上，美国1924年移民法案对日本人关闭了移民通道。这些因素促使更多人到南美去。据日本拓务省的统计，1924－1930期间，共有约8 000人抵达秘鲁[5]。这一阶段移民的典型特征是从国内投奔已在秘鲁的亲友，由亲友作担保并作邀请移民的申请，故而又被称为"邀请"移民。

3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和秘鲁对日本移民的不断限制，秘鲁的日本人数量渐渐趋于稳定。到1940年，秘鲁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有17 598名日本人居住在其境内，此外还有8 790名二代日裔。[6]

三、移民在秘鲁的情况

（一）经济方面

日本人只所以愿意背井离乡到秘鲁这个遥远的国度，就是希望赚到足够的钱然后返乡，然而农场主的肆意违约和百般压榨使这一愿望变得遥不可及，恶劣的生活环境更夺走了不少人的性命，在早期艰苦的日子里，许多日裔逃出种植园另谋出路。在前2批的契约劳工1 771人中，有303人死亡，425人在失望中归国或二次移民，留下来的人只有不到60%。[7]

契约期满后，除少数日裔租种土地继续务农外，大部分人摆起了摊铺，退出农业，向商业和服务业的转向。1907年时利马市内已经有日裔商贩300余人，并已经在个别行业如理发业崭露头角。[8]此后十余年间，越来越多的日裔倾向于移居到利马、卡亚俄等少数发达城市及周边地区，显然那里有更多的机遇。除理发店外，日本人经营的小餐馆、钟表修理、咖啡、茶饮店等不断增多，逐渐取代了这一领域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支配地位。有意思的是，早期利马市民对日本人的有限印象使他们一度成为"水管工"的代称。1927领事馆的调查显示，利马的日本人从事的职业种类已达到36种，在3345个商业店铺中日本人占了746个，超过任何其他外国人群体。[9]在小商品市场，日本人从业人数最多。他们经营的杂货店，定位于中下消费阶层，价格低廉，多为穷困的印地安人所光顾。日本人的勤俭、精明和对行情的敏锐把握使其迅速积攒起不少资金，经济上站稳脚跟后，很多人联系日本国内的亲友到秘鲁来帮忙，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到30年代左右，日本人的经济达到了巅峰阶段，当时大街小港充斥的日本杂货店和摊铺尤为引人注目。其中，少数富裕商人开始投资设厂，主要分布在粮棉加工、服装、汽车配件等轻工行业。农业方面，由于精耕细作，日本人往往能获得较高的单位面积产量，很多地主愿意把土地租种给他们。积累了一定资金后，日本人也开始购买土地。以日本人数较多的香卡河谷为例，30年代一项调查表明，在河谷12家大型农场的827名佃户中，日本人占了一半。加上已经购买的地产，据估计有80%的土地处于日本人的耕种下。[10]棉花是秘鲁的重要经济作物，大量日本农民集中到这一种植领域，一些机构推测日本人一度生产了全国产量的15%。

总之，日本人在经历了早期十余年的艰苦期后，除部分继续务农外，大部分从乡村聚居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商业和服务业领域。多数日本人充分发挥中间商的角色，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二）社区方面

初至秘鲁，文化的显著差异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使移民的日子格外艰难，秘鲁政府所宣传的对日本移民的优惠和补助政策从未

©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落实，加上高度重视血缘纯洁性的传统文化影响，日本人习惯于聚居在一起，相互扶持。劳工离开种植园后，最初三三两两地住在种植园周边或村镇上，移民数量渐渐增多使这些聚居点成为早期的日裔社区。随着日本人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聚居点也不断往城市集中。到 1921 年，利马省已聚居了 7700 余名日本人，约占当时秘鲁日裔总数的 70%。[11]此后这一比例基本稳定。

日裔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日裔社区也在不断壮大。在高度集中的聚居点，日本人组建了大大小小的社团。从各种商业性组织、生活管理组织到以地域划分的县人会，最鼎盛时数量过千。1918 年，在领事馆的支持下，中央日本人会在利马，此后在各社团中居于领导和协调地位。中央日本人会与领事馆保持紧密的联系，其权力极大。

在社团的组织的推动下，日本人建立了自己的信贷机构，并开办日文报纸，创办服务移民子女的社区学校。在这些学校中，日语和日本文化的教学占了很大比重，对故土念念不忘的很多家长甚至把孩子送回日本接受教育。

（三）秘鲁的排日

二战前的日本移民与当地社会关系的突出特点是双方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主要通过排日运动体现出来。

在早期契约移民阶段，主要摩擦发生在种植园内，矛盾的焦点多关于薪金和待遇问题，这种双方之间的负面情绪影响是有限的，社会上零星的排日运动也缺乏响应。随着日本移民数量的增多，排日情绪在更大的范围内表现出来。尤其是 20 年代后，民间的排日思想愈发活跃，30 年代其影响已遍布全国各阶层，并在政府层面占据主流。

民间的排日活动主要表现为各行业各领域呼吁对日本人的排斥、排日游行、与日本人的群体性冲突、针对日本人的抢劫等形式。媒体最为积极，多家报刊长年进行反日宣传。官方的排日体现在针对日本人的 1932 年 80%法案、1936 年移民限制法案，以及不断增加的针对日本人的各项繁琐的管理规定等。[12]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排日运动达到高潮，秘鲁政府还强行将超过 1700 名日本人驱逐到美国看押。

在 20 世纪上半页，拉美不少国家对日本人都存在排日现象，然而很少有国家像秘鲁这样激烈，与其他国家相比，秘鲁的排日除了种族偏见、经济上的嫉恨和移民融入性低等共通原因之外，笔者认为有不少独特因素。首先，秘鲁的日本人聚居在利马、卡亚俄等少数发达省份，这些地区作为秘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很容易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而小商贩和流动摊铺也由于整天抛头露面，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下。其次，到 30 年代，日本人已经成为当时秘鲁最大的外国人群体，当然成为日益抬头的民族主义者的首要攻击目标。第三，30 年代以后秘鲁陷入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贫困化刺激更多的人把日本人作为替罪羊。第四，日本人在秘鲁政界缺乏影响力，成为利益调整的牺牲品在所难免。

四、结语

二战前日本人向秘鲁移民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他们在秘鲁的存在和发展推动了早期日秘两国的交往，经过 40 余年奋斗，日本人在经济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并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日裔社区。然而，多种因素造就的秘鲁的排日运动给双方关系带来长期负面影响，给时至今日秘鲁日裔的尴尬处境埋下了历史的种子。

参考文献：

[1] 日本外务省网站.http://www.mofa.go.jp/mofaj/area/peru/data.html#06.

[2]李卓.日本近现代社会史[M].世界知史出版社,2010:325-339

[3]Ignacio Lopez-Calvo, The Affinity of the Eye: Writing Nikkei in Peru,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13:2

[4]アメリアモリモト.ペルーの日本人移民[M]. 日本評論社.1992:70. 另参见 ペルー契約移民データベース,http://dji.jomm.jp/jp/search.php

[5]拓務省拓務局. 海外移住統計 昭和 10 年 10 月,東京:拓務省拓務局 1937:32-33

[6] John K. Emmerson. The Japanese in thread: A Life in the U.S. Foreign Service [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78:131-139

[7]外務省. 日本外交文書 第 42 卷第 2 册. 日本国際連合協,1961:127

[8]外務省通商局.移民調査報告 第一期.東京:外務省通商局,1911:45

[9]C. Harvey Gardiner. The Japanese and Peru 1873-1973 [M].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75:37

[10]J.F. Normano, Antonello Gerbi. The Japanese in South America.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43:87

[11]外務省通商局. 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人口表 大正 10 年調.東京:外務省通商局,1925:表 35。

（上接第 24 页）密共参国政"[7]3107 的局面。唐武宗在位时期宦官势力得到有效抑制。他曾夜诏学士韦琼，令其草制授崔铉为相。此事"宰相、枢密皆不之知。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悫，不敢预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刘、杨懦怯，堕败旧风故也'"[8]3065。"旧风"即指枢密使参与任命宰相的惯例，由此可见，有关除授大臣的决策过程，枢密使例得预闻。

枢密使还常常插手皇帝的废立。唐后期，皇帝大多为宦官所拥立，其中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9]179。除唐敬宗以太子身份继位之外，其余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帝，皆为宦官所拥立。

2.宦官担任大量使职

此外，唐代宦官还通过担任大量的使职而攫取了多方面的权力，由宦官把持的内诸司使是宦官干政的重要途径。唐代中叶以后，使职差遣制度逐渐发展起来，而且往往演化成固定的官职。宦官之所以能够越来越多地干预朝政，以致与南衙宰相抗衡，与内诸司使是分不开的。唐中叶以后，内诸司使多以宦官为之。内诸司使系统是宦官北衙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结构庞大，内部组织分部细密，唐长孺先生在其《唐代的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一文中为我们清楚的勾勒出了这个庞大的内诸司使系统[10]252-282，在此就不赘述。

三、结语

唐代的宦官势力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及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唐玄宗是唐代历史上第一位重用宦官的君主，他对宦官势力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宦官干政现象出现于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方方面面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政治秩序发生了严重的紊乱。其中最深刻的变化就在于，安史之乱对君臣关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君主更加不信任朝臣，君臣关系日益紧张。安史之乱期间，宦官被君主扶植起来，他们受到君主的重用，被授予禁军、监军、枢密等职，在权力结构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 263 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后晋)刘昫.旧唐书:第 184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牟志平.唐宦官年表[A].史念海.唐诗论丛(第二辑)[C].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4]张国刚.唐代监军制度考论[J].中国史研究,1981(2).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 258 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后晋)刘昫.旧唐书:第 163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9.

[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 250 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